

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石棺床

□ 王雁卿

十六国及北魏时期的鲜卑族有其独特的葬俗,如殉牲、头骨西向、陶罐分置于头足两处的葬式,夹砂戳刺纹罐、壶、罐的陶器组合,不同类型的陶俑群都身着典型鲜卑服饰,墓内木棺呈前高宽、后低窄的形状以及石棺床等等,反映了鲜卑族的民族风格的传承关系及与汉民族的交流关系。近年来,大同地区出土了几件石棺床,属北魏平城时期的的遗物,现介绍如下:

1. 敦煌公宋绍祖墓出土的石棺床^[1]

砂岩。出土于雁北师院的太和元年的宋绍祖墓,置于石椁内,平面为倒置的“凹”字形,长 239 厘米,宽 188 厘米,高 31 厘米,中心宽 103 厘米。前立



图一 宋绍祖墓石棺床



图二 宋绍祖墓石棺床侧板

面中部由两块石板搭成,整体呈倒立山字形,石板上部边缘横向雕刻二方连续的波状忍冬纹带及联珠纹带,其下三足间雕有水波纹壶门,中间足部雕兽面,两角间夹忍冬纹,眼眉上翘,但眼仁未雕出,两侧足空白;棺床中部两侧又各垂直顺置一块石板,均呈“冂”形,同样上部横雕波状忍冬纹带,内框雕水波纹,一侧板外侧足空白,还未及雕刻,内侧足雕一只立猴前爪执卧虎的双耳,生动可爱,虎的大尾像伞一样遮在上方。另一侧板相似,只是内侧足雕忍冬纹花卉(图一、图二)。

2. 司马金龙墓出土的石棺床^[2]

司马金龙墓的石棺床呈南北向置于墓后室西部,由六块浅灰色细砂岩石板组成(前、后、左、右各一块,上面两块),长 241 厘米,宽 133 厘米,高 51 厘米。棺床前立面石板呈倒立山字形,上部以波状缠枝四叶忍冬纹作长方形边框,中间雕波状缠枝忍冬纹,波状藤蔓各处伸展忍冬叶枝,其分枝的端部托着一个大莲瓣底,之上盛开大荷叶,叶两侧翻卷着忍冬叶,波心内雕呈各种游戏坐姿的形态各异的伎乐童子 and 珍禽瑞兽。伎乐共 13 个,均头梳髻发,额头中部



图三-1 司马金龙墓石棺床前板 1



图三-2 司马金龙墓石棺床前板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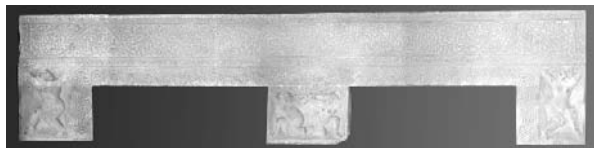


图三-3 司马金龙墓石棺床前板 3



图三-4 司马金龙墓石棺床前板 4

留有发髻，两耳各垂一撮长发，上身裸，大腹便便，下身着犊鼻裤，佩颈饰，阴刻臂钏、腕钏、足钏，帔帛从颈后绕两肘飘于身体两侧。从右至左分别为喊话指挥的童子与回首的长尾羽鸟，持钹的童子与回首行走的虎，展双手打鸡娄鼓的童子和昂首的狮子、吹箫的童子与带羽冠展翅的凤鸟，双手执排箫的童子



图三-5 司马金龙墓石棺床前板 拼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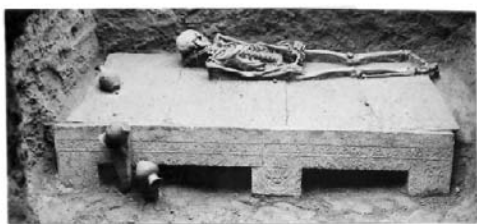
与疾走带翼的狮子，弹曲颈琵琶的童子与跃爪吐忍冬叶的龙，手持帛的舞蹈童子与半卧的狮子，怀抱琵琶的童子与回首方尾羽的人面鸟，双手握埙的童子与俯卧夹尾的狮子，回头吹鸞箫的童子与昂首阔步的龙、打行鼓的童子与带翼的狮子，持横笛的童子和回首长尾羽鸟，击细腰鼓的童子和长尾鸟^[3]。其下部三足间雕有水波纹壶门，三只床足以连珠纹为边框，框内高浮雕四个力士，中间两个力士的上部浅浮雕兽面。力士身躯矫健，上身裸，两乳突出，大腹便便，下身着犊鼻裤，阴刻臂钏、腕钏、足钏，帔帛从背后绕两臂飘于身体两侧。两侧足的力士呈半蹲状，反举双手作承托石床的姿态，一个发髻分九瓣，额中间有三条抬头纹，两眉相连成弓形，鼻梁上有横带装饰与横纹，唇起露齿，耳佩圆形饰；另一个发髻两分成八瓣，发末端卷起，额头有三条抬头纹，半圆眉，鼻间有横带装饰与横纹，张嘴露上齿咬住下唇，颌下有髭，耳佩圆形饰；中间二力士反身相对，呈胡跪状，颈佩长及腹脐的璎珞，一手反托上部的兽牙，一手抓着兽面两边的獠牙，髡发，头顶中部发式呈几字形，两耳各留一撮头发，眯眼，面部祥和而光滑呈童子相；而兽面长眉弯曲，两耳竖立，双目圆睁，鼻孔外露，张嘴呲牙（图三）。

3.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 M112 出土的石棺床^[4]

砂岩。石棺床东西向置于墓室北部，无棺，尸骨仰身直肢葬于棺床上。石棺床面由四块长 95、宽 75 厘米石板拼成，板下垫土，棺床前立面用两块石板拼成倒立山字形，稍倾斜地靠在床面上，石板间有榫卯结构相连，石板上部横向雕波状忍冬花纹带，“冂”形边框雕水波纹，两侧床足雕净瓶，上插忍冬花，中间床足雕兽面衔环，兽面上雕两朵正面莲花，兽面小眼，长眉上翘，蒜头鼻，鼻下衔圆环，环内兽牙排列整齐，舌头吐露。棺床前板总长 213 厘米，高 39 厘米，两侧足宽 22.5 厘米，中间足宽 26.5 厘米，板材厚约 8.5 厘米。背后上缘有凹槽，与石棺床面相接（图四）。

4. 大同南郊智家堡村北砂场出土的石棺床^[5]

细砂岩质。棺床前立面石板同样呈倒立山字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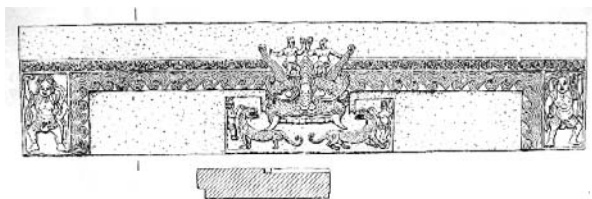


图四 大同南郊北魏墓群 M112 石棺床 下) 前板

上部边缘横向雕刻二方连续的波状忍冬纹带,其下三足间雕有水波纹壶门,中央一床足较宽,上雕一瞠目獠牙的兽面,头顶立相对的二人,束发,上身裸,下着犊鼻裤,均一手抚兽角,一手持物相对,似莲蕾;下雕二虎回顾,虎头两侧各立一位手执虎耳却神情安详的人物。棺床左右两床足各雕一位金刚力士形象,逆发,披帛,上身裸,下身着犊鼻裤,一手叉腰,一手手掌向上撑着棺床。石板宽 194 厘米,高 44 厘米,厚 10.4 厘米,背后上缘有凹槽,与石棺床面相接(图五)。

5. 智家堡村出土的石棺床 大同市公安局缴获,现藏于大同市博物馆)

砂岩。棺床前立板整体呈倒梯形,而雕刻部分呈倒立山字形,两足间的石板并未凿空,仅象征性地凿下约 1 厘米,石板面上留有凿痕。棺床上部边缘横向雕刻二方连续的波状忍冬纹带,其下三足间雕有水波纹壶门,中央足上部雕兽面,两眉弯曲,圆眼大睁,下部雕两个圆形涡纹;两侧足呈梯形,各阴



图五 智家堡北砂场石棺床前板



图六-1 智家堡石棺床前板



图六-2 智家堡石棺床前板两侧人物

线刻一侍者,头戴鲜卑垂裙皂帽,身着交领齐膝长襦,下着束口裤,足蹬靴,双手捧钵于胸前,侧身向中间站立,右侧人的身旁竖向阴线刻三字“刘子奴”。棺床前板长 240~227 厘米,高 39.5 厘米,两侧足宽 21.5 厘米,板厚 6.5 厘米。背后上缘有凹槽,与石棺床面相接(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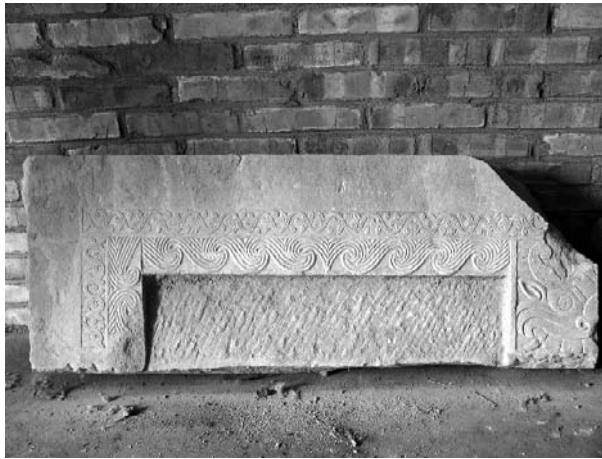
6. 智家堡村出土的几件残石棺床前立面石板,多数藏于山西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

(1) 砂岩。仅余棺床左上角及残左足,一件与上述棺床纹饰略同,只是在波状忍冬纹与水波纹之间增加了一周绚纹,折角处又雕一朵正面形八瓣莲花。残长 49 厘米,高约 41 厘米,板厚 6 厘米(图七-1)。

(2) 砂岩。纹饰较复杂,但磨损严重,图案漫漶不清,棺床最上边缘为环状忍冬纹,忍冬藤蔓对称向内弯曲成椭圆形环并向环内伸出二枝对称式四瓣忍冬叶纹,向两侧伸展,中央立瑞兽。藤与藤相并拢处



图七-1 各式残棺床



图七-3 各式残棺床



图七-2 各式残棺床

用细带系,环与环的上下部间隙又伸出一枝三瓣忍冬纹。环状忍冬纹与下部边缘的水波纹间雕窄带绶纹,其左足雕一长方庑殿建筑,下立一袖手着襦裙者。残长30厘米,高37厘米(图七-2)。

(3) 砂岩。仅余石板的一半,有两足,两足间的石板并未凿空,仅象征性地凿下约2厘米,石板面上留有凿痕,雕刻部分呈“门”形,上部及右侧边留白,中部横雕波状忍冬纹带与水波纹带并下折至右足,中央足雕兽面。石板背面上方有楔形取石凿痕。残长110厘米,高约40厘米,右侧足宽22厘米,板厚10.5~11.5厘米(图七-3)。

(4) 砂岩。残留两块,从其图像上看应是一体。一块略呈长方形,是棺床的上部边框,残存半朵莲花与一个完整兽面,但已无法判断其所在棺床的位置,残长32厘米,高25厘米;另一块残,呈青铜器“戈”形,存有一足,横框上部从右至左依次雕莲花、行龙、团莲花、兽面,下部雕单线水波纹带,兽面以左有长方形榫口,团莲之下有足,足略呈束腰梯形状,上雕一门吏。团莲的外周双莲瓣,中央有莲蓬;行龙向左侧行走,龙体瘦长,长角弯曲,长吻露齿,肘部卷毛雕成三叶忍冬状,龙体之外的空白处雕满忍冬叶;兽面两细角横向展开,角之表面附有绒毛,两角间有山形装饰,兽眼呈长椭圆形,獠牙外龇,长尖舌两侧向中间卷起;门吏头戴笼冠,长眉细目,高鼻小嘴大耳,上衣虽被破坏,但仍可辨宽袖,下着间褶长袍,方头高履,手持长矛面左而站。棺床残长134厘米,横框高27.2厘米,床高(带足高)59厘米,足宽21~23.3厘米,榫口长、宽8厘米,板厚11.5厘米(图七-4、图七-5)。

雕门吏的足两侧上部的棺床板左右有延伸,因此不可能是棺床立面的边足,但门吏侧向也不可能是中间足,所以笔者推断此棺床有四足,与西安出土的安伽墓的石榻类似,两者的床足都呈束腰状,有可能是晚期棺床的形制。而且床足雕有门吏的做法多见于洛阳出土的石棺床,门吏的服饰及形象也与云冈石窟晚期供养人相同,所以判断此棺床的时代略晚,可能在迁洛之后。龙门石窟普泰洞涅槃图(524~525年间)佛陀躺着的床样便是三个束腰状足的床,只不过带有背屏(图八)。

古代墓葬中棺槨之下,略高于基底,或木制、或



图七-4 各式残棺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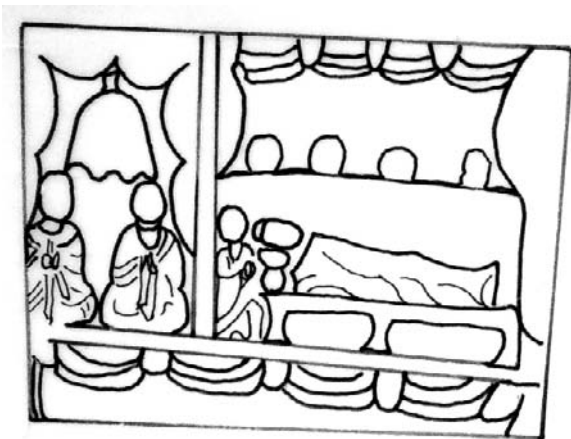
图七-5 各式残棺床

石制、或垫的土层、或用砖砌等等的设置，人们常称之为棺床。北魏之前在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中便已出现。印山越国王陵中室设棺床。汉代诸侯王陵内多置汉白玉铺成的棺床，上置棺槨。高句丽墓的墓室多构筑在地表上或半地下，或高出地表的石墓基上，多设石质棺床，之上有木棺。河南伊川晋墓发现砖棺床^[9]等等。所述棺床不见有刻意装饰，床上均设有棺槨。而发掘出土的北魏棺床，除司马金龙墓外，石质或砖砌棺床之上多不设棺槨，尸体直接置于棺床之上，如大同南郊墓群 M112 不见棺木；宋绍祖墓虽被盗，但石棺床上只见两个石灰枕，不见棺木。内蒙古、辽西等地发掘的鲜卑族北魏墓不见石棺床，有的墓只出现了砖棺床^[9]。托名晋葛洪撰《西京杂记》卷六，略云：“魏襄王冢，皆以文石槨，高八尺许，广狭容四十人……中有石床、石屏风，宛然周正，不见棺槨明器痕迹……”又“魏王子且渠冢，甚浅狭，无棺槨，但有石床，广六尺，长一丈。石屏风，床下悉是云母。床上两尸，一男一女，皆年二十许”^[10]。说明魏

晋时已有石围屏棺床的葬俗，与洛阳沁阳出土的棺床型制相同。在东北辽阳地区相当于魏晋时期的墓葬，多流行尸陈铺尸床无木槨棺葬，头枕两端起翘的石灰枕^[11]。看来此葬俗不是鲜卑族及东胡各族的葬俗。随葬石棺床是汉地葬俗的传统，还是与现在发现的“粟特棺床”有关，是来自西域的葬俗，及如何变化发展而来，还要进一步研究。

从上述棺床看，北魏平城时期棺床的形制有二型，一型是宋绍祖墓的“凹”字形，二型整体呈长方形，前部立板呈倒山字形或四足状，所出土的石棺床以二型居多。即使是宋绍祖墓的“凹”字形，其前部立板呈二型状，二者图案并不相连，且其两侧的石棺板均呈不完整状态，还应该有延续的部分，二者图案也不对称，没经过统一设计，所有棺板上的图案均未完成，所以有可能两侧棺板不是为宋绍祖墓专门雕刻，而是埋葬时用临时的构件搭配的，棺床型制可能因石槨而构建。迁洛以后的石棺床床体为二型，之上多加有石围屏，床足上部边沿多刻波状忍冬纹、联珠纹、水波纹等或以波状忍冬纹为框，中间界格内阴线多刻异禽怪兽，床足刻铺首、手持金刚杵相向站立的力士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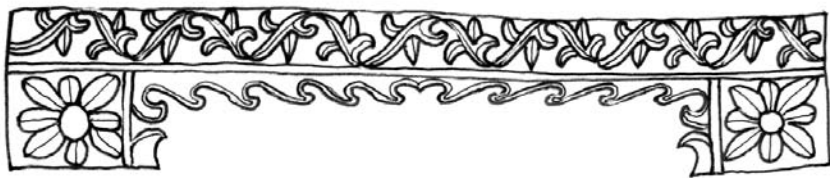
北魏的石棺床形制，有学者认为来源于汉代的榻。供多人使用的围屏榻，在大同北魏智家堡石槨壁画、太原一电厂北齐壁画墓中和北齐徐显秀墓壁画中均有图象^[12]；有的认为来源于阳宅之床^[13]，“模仿当时人们生活中所用的床，周围树立屏风，形制与传为东晋画家顾恺之所作的《女史箴图》中的床十分一致，许多精彩的线刻画像即出现在屏风形式的石板上。这种结构或即文献中所说的‘连榻’”^[14]。



图八 龙门石窟普泰洞涅槃图



图九 云冈石窟第6窟南壁维摩坐榻图



图一 美国纳尔逊美术馆藏太和十八年佛造像底座

但也有人认为与床无关,而可能与佛教中涅槃思想有关^[19]。

郑岩论及石棺与石棺床的象征意义时说,就其涵义来说,墓室是死者在地下的起居之所,墓室内的随葬品的装置是为其死后的“生活”准备的,是一个具体的视觉形式的“家”。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死者同样需要寝殿和床榻,已死的墓主在艺术家的想象中延续着各种有生命的活动^[19]。因此,平城出土的不见围屏的石棺床其象征意义是否可能是当时北魏时期北方人家的火炕,而形制采用榻形,尤其平城时代北魏后期出现的方形墓中砖砌棺床占据整个墓室半部,更像一个火炕。火炕的考古资料最早出现在中国的东北地区,黑龙江友谊县魏晋时期的凤林古城二号房址发现有曲尺形火炕。吉林省通化市万发拨子遗址也发现了3座魏晋时期的火炕遗迹^[17]。文献资料中《水经注·鲍丘水》:“水东有观鸡寺,寺内起大堂,甚高广,可容千僧,下悉结石为之,上加涂墍,基内疏通,枝经脉散,基侧室外,四出爨火,炎势内流,一堂尽温。”^[18]虽不是典型的火炕,其结构与炕相似。由此可以推想平城时期家居就可能已有了炕的设置。

北魏平城时期所发现的石棺床的装饰图案,形式上多属一种程式化,立面上部雕一带波状翻卷忍冬纹,之下的门框则雕对称的水波纹,图案的主要变化是三个床足,虽有不同,但多是北魏平城时期

的流行纹样,其中装饰除兽面、龙、虎、凤鸟、净瓶、鲜卑侍者、门吏等外,还有许多图案和装饰纹样是外来的,如护法力士、伎乐童子、狮子、忍冬纹、水波纹、联珠纹、莲花纹等,繁密而华丽的装饰效果,反映了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活跃。而这一切均可以在佛造像中找到类似的布局,基于一种普遍的、流行的模式,云冈石窟第6窟南壁佛传故事“文殊问疾”图中的维摩坐榻图案与司马金龙墓的石棺床的图案有相似之处,上部雕波状忍冬纹带,两足各雕一个反

手承托石榻的童子(图九)。以及现存的北魏时期单尊佛造像须弥座之下的底座呈榻形,座上纹饰与石棺床纹饰相同(图一、图一一)。

瑞兽则多是继承汉魏传统,如龙的形态特征是



图一一 美国纳尔逊美术馆藏太和十八年佛造像

修长洒脱,奔放活泼,逐渐脱离走兽的姿态,均细身长尾,无须,大耳,独角长弯,上唇超前且上弯,足爪三趾,比例匀称,写实性较强,同北魏平城时期佛教艺术中的龙相同,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而凤鸟的形态相对来说比较静,随波站立,或回首或俯视,肥喙;狮与虎整体形态类同,但狮子颈后有弯曲的长毛,尾端呈忍冬花状;人面鸟类形象在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壁画、画像砖上多见^[19],如宁夏固原北魏墓的漆棺上绘有三个人面鸟形象;邓县出土的彩色画像砖墓有一块千秋万岁画像砖上有一人面鸟身的形象,其下铭“千秋”。雕兽面镇墓驱邪,其意义与平城始见的兽面瓦当和兽面铺首相同;伏虎是“则可能是象征着对邪恶势力的镇压”^[20]。

联珠纹是一种典型的波斯纹样,萨珊王朝时期大量用于建筑和其他实用品上。与忍冬纹、莲花纹、护法力士、伎乐童子等一起随佛教东传带入中国,云冈石窟第20窟主佛像僧祇支边缘以联珠纹和忍冬纹为饰,云冈石窟此类纹饰随处可见,北魏平城出土的漆棺画上多绘有联珠纹、忍冬纹与莲花纹等图案。

金刚力士,即关于托举负重的神类形象早在战国时期已出现,洛阳金村出土的青铜错金器物角端有负角怪兽,还有汉代马王堆帛画下部托举重物的袒腹力士、山东临沂白庄出土的东汉晚期的画像石墓中,拱门的立柱上端刻有负载承托的戴尖帽的胡人像;而在键陀罗和印度佛教艺术品中也出现了托举力士的形象,卷发丰髯,肌肉发达,是依据佛经中的夜叉或山神等神格来制作的。夜叉本是达罗维荼民族之神,于佛教为护法神,言能啖鬼。《慧苑音义》卷下曰:“夜叉,此云祠祭鬼,谓俗间祠祭以求恩福者也”。有学者称其为“阿特拉斯”,是古希腊神话中支撑宇宙的巨人。在中国的石窟寺中,夜叉形象取自印度袒腹胖汉、嘴上留髭的特征,云冈石窟的地夜叉多以托负承重的力士形象出现,与棺床上的夜叉形态相同,一样的造型在第7、8窟有多身雕刻。这种现象意味着中外不同文化的殊途同归^[21]。

床足雕门吏、手持忍冬花的侍者等其寓意可能与棺前后挡门两侧的门吏、侍者意义相同。湖北魏1号墓漆棺足档中部绘传统木构建筑式样的门楼,门外两旁各绘左右对视的守门侍者^[22]。

石棺床的石质均为砂岩。前面立板有整体石板 and 拼合石板两种,葬具的雕刻技术丰富,装饰带、兽面多为浅浮雕,两侧足的夜叉则是高浮雕,而司马

金龙墓石棺床的缠枝忍冬纹填饰伎乐童子和瑞兽珍禽的装饰带则是减地平雕加阴刻线,可见手法多样。

[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7期;刘俊喜《平城考古再现辉煌》,《文物世界》2001年第1期。

[2]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

[3]乐器考证参见王恒《司马金龙墓石雕乐伎乐器研究》,《文物世界》2000年第5期。

[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第8期。

[5]王银田、曹臣明《北魏石雕三品》,《文物》2004年第6期。

[6]《北朝研究》1997年第1期封三。

[7]龙门石窟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1年。

[8]钱公麟《苏州文物考古工作四十年》,《东南文化》2000年增刊1;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伊川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伊川县槐庄墓地晋唐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5年第3期。

[9]郭素新《内蒙古呼和浩特北魏墓》,《文物》1977年第5期。

[10]转载姜伯勤著《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之第三章《中国祆教画像石的“语境”》2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4月版。

[11]辽阳市博物馆《辽阳市三道壕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90年4期。

[12]张庆捷《入乡随俗与难忘故土——入华粟特人石葬具概观》,《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4月版。王银田、刘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文物》2001年7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文物》1990年12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王家峰北齐徐显秀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0期。

[13]邓宏里、蔡全法《沁阳县西向发现北朝墓及画像石棺床》,《中原文物》1983年第1期。

[14][16][20]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

[15]宋馨《司马金龙墓葬的重新评估》,殷宪主编《北

(下转23页)

间性的特点。造像风格方面,因风化严重,服饰和面部多漫漶不清,但无论是单躯菩萨还是胁侍菩萨都不同于天龙山石窟^[4]菩萨“S”形自然扭曲的形态,而更趋向于龙门石窟菩萨的形态。

三、结 语

长治地区位于晋阳、洛阳、邺城的三角地带,晋阳的天龙山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邺城的南北响堂山石窟的艺术水平几乎代表着隋唐时期北方地区石窟艺术的总水平,长治地区的石窟、摩崖造像艺术势必要受到这三个地区的影响。但是上述三处石窟都是皇家或者说是官方建造的石窟寺,反映的是佛教思想在统治阶层理念下的物质形态。从两汉佛教传入历经北朝到隋唐时,佛教思想早已在民间广泛传播开来,这从北朝隋唐为数众多的小型石窟、摩崖造像不难看出。石窟、摩崖造像作为精神信仰的一种物质表现形态究竟在民间是怎样传播、发展、变化的,以及这种物质形态的变化所反映到的

底是怎样的精神信仰的变迁很少受到关注,本文仅就山西长治地区一处唐代摩崖龕像的调查做一简报,为唐代小型石窟艺术的研究增添新的资料。

[1]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窟调查组《山西平定开河寺石窟》,《文物》1997年第1期。平定开河寺石窟属东魏的第2窟、北齐的第3窟就有这种“凸”字型龕。

[2]笔者于2007年5月实地调查,石窟正壁、右壁为“凸”字形龕,资料另文刊布。

[3]温玉成《龙门唐窟排年》,收录于《中国石窟-龙门石窟》,文物出版社,1992年。

[4]李裕群、李钢《天龙山石窟》,科学出版社,2003年。

(作者系山西大学考古与博物馆学硕士研究生)

(上接18页)

朝史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郑岩《河西魏晋壁画墓初论》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文物出版社,2001年。

[17]火炕的详细资料见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友谊县凤林古城二号房址发掘报告》,《考古》2000年第11期。

[18]北魏酈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鲍东

水》卷十四,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

[19]朱岩石《“千秋万岁”图像源流浅识》,《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131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

[21]金申《关于神王的探讨》,《佛教美术丛考》63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

[22]山西省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湖东北魏1号墓》,《文物》2004年第12期。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